

七君子之狱

● 单于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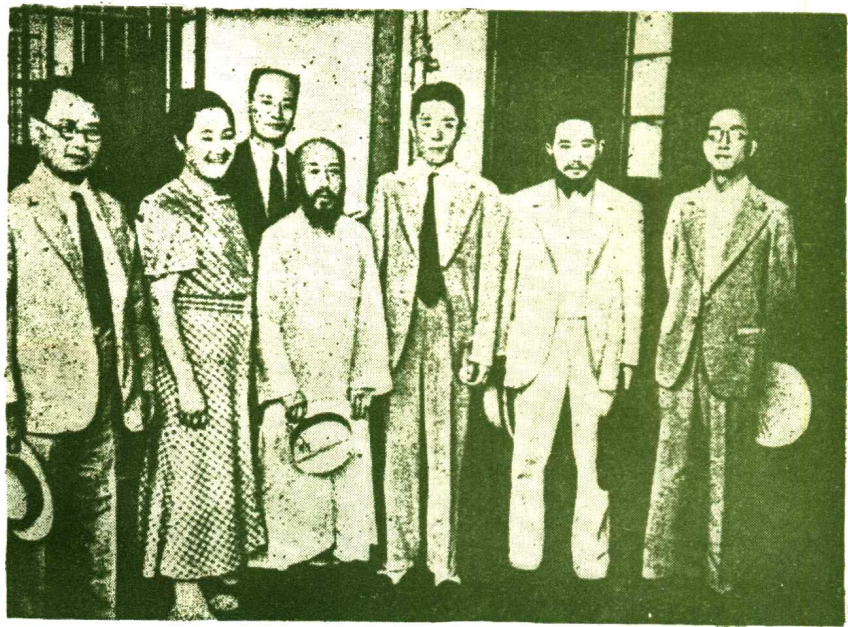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24
9

QI JINZI ZI YU

● 单于越

七君子之狱



上海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范一辛

七君子之獄

单于越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95000

上海绍兴路5号

书号：104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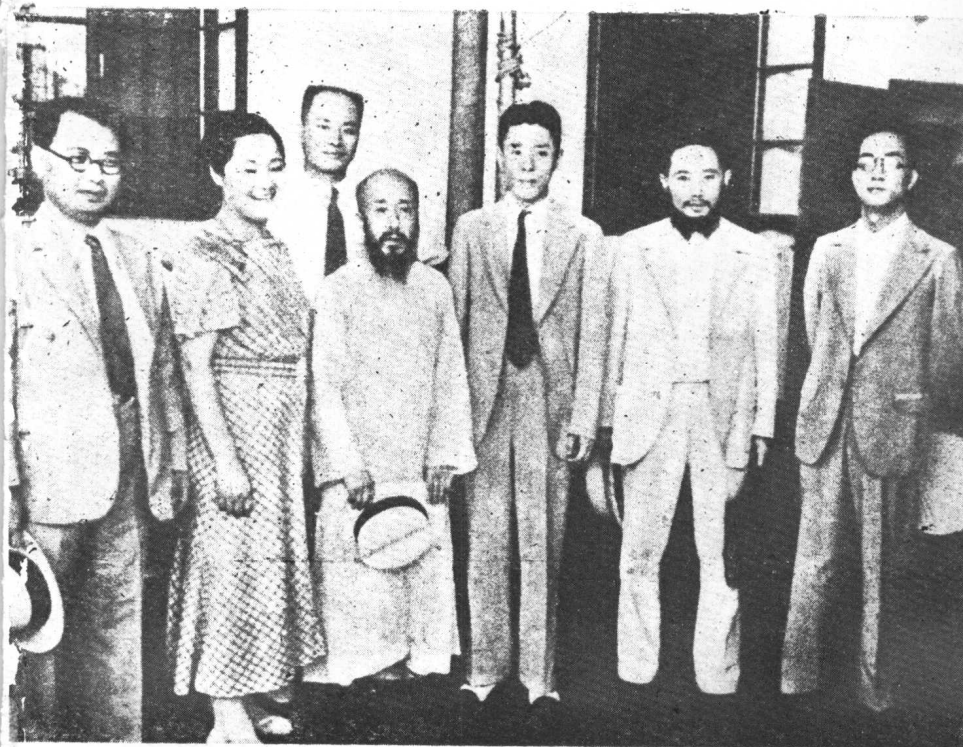
ISBN 7—5426—0009—5—I·3

定价 1.40元

内 容 介 绍

三十年代，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酝酿成立救国会的组织，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图存运动。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惊恐，力图以笼络手段窃取对救国会的领导权，但屡遭救国会领导沈钧儒等人的拒绝；于是便采用镇压手段，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将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七人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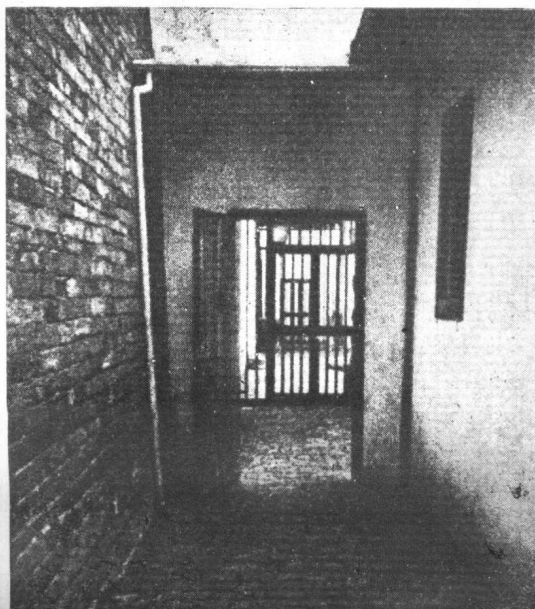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以记实小说的笔法，系统地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始末，文笔生动，史料翔实，再现了当时斗争的场面，这对读者了解当时的爱国斗争，将获得深刻的印象。



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位领导人获释、步出看守所



沈钧儒
和他的“难
友”在狱中
阅读、写作



苏州高等法院
看守所内的甬道

何人有勝利只有
民族解放是真正
的勝利

韋奇

廿六年八月六

以牙還牙
以血還血

廿六年八月六

沙千里

歷年坎上的崎嶇碾碑前面的新難我
們好上火錢沒有退後祇向前

韋奇大政歌辭為贈

二十六年八月六沈鈞儒

韋奇 沈鈞儒等救國會
领导人出獄后，應歡迎者
要求写的題詞。

無此閒情絲毫悵

有腔熟與敦前驅

由蘇起能逢牛偶成

章乃英

教人學通到這步田地我們
祇有奮鬥犧牲才有生路
才能獲得真正的和平

史良

廿六年二月百

事到於今我是不可以退縮的
了只有在抗戰的血光中
能我列強們民族的奴
生命

肖日王名

我們要努力喚醒每個
中國人有甯為抗戰
而死不願偷生而做亡
國奴的決心萬眾一心
必得最後的勝利

李天德
廿六年一月

光照史册的救国会运动

——现代史小说《七君子之狱》序

孙 晓 村

救国会运动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它当时在反映、表达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这一强烈愿望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光照史册的。救国会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第二次运用统一战线的方针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图存斗争的又一次成功的实践。当时的情况，简要说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从东北伸向华北，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爱国将领和士兵忍无可忍，愿誓死抵抗，但国民党政府顽固地坚持不抵抗主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一次又一次调集全国的部队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使国力消耗在内战之中。至于经济情况，可以说百业凋零，人民生活每况愈下。那时，稍有一点知识的人都看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苦于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连呼喊的自由都没有。所以，在1935年间，上海、北平、南京等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宋庆龄、马相伯、冯玉祥等的支持下，一些爱国志士开始酝酿救国会的组织。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这个运动就以燎原之势，在各大城市燃烧起来，到1936年5月30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时，参加者有十几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包括政党）的代表约70人。“全救”的成立，使救国会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声势更为浩大的阶段。特别是由于救国会认

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的群众十分广泛。这一切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惊恐。蒋介石的对策是想用笼络的手段取得对救国会的领导权。1936年夏，蒋介石约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三位到南京商谈国是，派戴笠迎送招待。沈、章、李三位到南京后，住中央饭店。上海救国会通知在南京的曹孟君和我，同沈等公开往来，密切联系，将情况告知上海。记得谈了三次，陈布雷始终其事，蒋出场两次。谈话的中心内容：蒋提出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沈、章、李三位反复说明救国会的宗旨是抗日救国，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如果政府能做到这几点，人民自然拥护。词严义正，使对方无辞以对。沈、章、李三位回上海后，救国会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蒋介石一看软的不行，而且形势越来越对他不利，便决心采用镇压手段，于11月22日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但人心的向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少数独裁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七君子”被捕，反而使救国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以及国际友人纷纷提出抗议，发起慰问，直到出现中外轰传的高潮——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等到苏州的入狱运动，使蒋介石狼狈不堪。总之“七君子之狱”的唯一结果，是国民党政府的自我暴露和救国会运动的深入人心。

时隔50年，“七君子”已先后与世长辞，离开了我们。当年一起奔走的曹孟君也于1967年逝世。回首前尘，无限感慨。特别是50年后的今天，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国家正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政治上安定团结，经

济上欣欣向荣，国力、国威、人民生活都出现建国以来最好的情况，真是盛世如花，前程似锦，使人们更加怀念当年披荆斩棘的英雄们。感谢单于越同志广搜史料，创作《七君子之狱》一书，生动而又热情地再现了50年前的这场斗争，帮助年轻一代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是一件大好事。在单于越同志的鼓励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这篇短短的序文，就正于读者。

1986年5月于北京

自序

1985年春天,偶然得到一本《李公朴纪念文集》。开始,只是随便翻翻,但翻了几篇,便丢不下手,我被这位“君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事迹,尤其是书中叙述的“苏州之狱”深深打动了,这种“动”,大概也就是“创作的冲动”吧。我奇怪,为什么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这桩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竟没有在文艺领域中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我想,既然别人不写,我来试试。于是,我跑书店,跑图书馆,搜求一切有关“七君子”的书刊资料,甚至泡在图书馆里抄写、复印资料。大约整整一个春季,我在读、记、摘、抄中过来了。

从夏天开始,我动笔写作。我写得很苦,因为书面资料毕竟有局限性,对于有些重大事件,资料中只是一笔带过。有些资料互有矛盾,各执一说,甚至于连当事人自己的回忆录前后也有出入。采访吧,对象已有限,而当事人“七君子”俱已作古,过去当记者时,虽然对其中几位略有接触,但也只是“略有”,谈不到深入了解,我心目中缺少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这就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困难。我只能学习施耐庵写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办法,他是画出每个人的肖像贴在墙上,我是根据资料和采访所得,在心里勾划出“七君子”的轮廓形象,尽最大的努力描写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差别。但这种努力,虽非徒劳,却也未见成功,因此我下笔很慢,写写改改,改改写写,连自己也说

不清改了几稿。到年底总算定了稿，但回头一看，却不是开始设想的样子，我很不满意。

然而《解放日报》的阿章、孙竞男同志给了我很大鼓励，他们很快决定发表，把原稿改为每天1700字的若干小段，从1986年1月30日开始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一直到3月19日登完。当时题为《爱国七君子》。

连载发表后，陆续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有的热情鼓励，有的指出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处，有的提供情况和资料，有的多次来信反复商榷。我惊奇而欣慰，这些同志如此熟悉和关怀“七君子事件”！为此，我应该以更强的责任感来对待这部手稿。我根据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以及新看到的一些资料，对原稿又作了一番增删修订，易名为《七君子之狱》。

在采写过程中，承蒙徐盈、张启宗、陆诒、谢居三、刘峰、章立凡、邹嘉骊、刘大康、顾国权、孙诗圃、岑金华诸同志提示情况和资料，冯隽民同志帮我校稿；又承《解放日报》连载小说部同志们给我鼓励和敦促，谨此鸣谢。书稿付印前又蒙前救国会常委，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孙晓村同志作序，尤深感铭。

1987年是“七君子”出狱50周年，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民主革命英勇奋斗的前辈革命家们。

单于越 1987年2月于南京

目 录

光照史册的救国会运动

——现代史小说《七君子之狱》序

孙晓村

自 序	1
一 救国会的诞生	1
二 招 降	9
三 拒见蒋介石	16
四 舌战吴铁城	23
五 章乃器辞职	32
六 严寒前的抗争	41
七 午夜搜捕	45
八 二次投监	51
九 公安局移提	59
十 六君子转解	64
十一 狱中生活	71
十二 六个人是一个人	77
十三 史良投案	83
十四 沈钧儒赋诗	90
十五 诱 降	98

十六	答 辯	105
十七	初 审	112
十八	申请回避	120
十九	二 审	126
二十	出 狱	131
后 记		139

一 救国会的诞生

1936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

数九寒天，朔风凛烈。

在上海苏州河北的市商会门外，探捕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在武装探捕后面，是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红头阿三”（英捕房的锡克族巡捕）。最后一排是十数辆警车。带头的是一个英国“三道头”（捕头），他手持短枪，面对着市商会大门挺着个大肚皮，仿佛正待捕食的蛤蟆在鼓气：你要出来，我就吃了你！

在市商会的大院中，近千名群众正整队准备出发游行。他们是来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爱国同胞。从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亡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蚕食侵略，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以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前驱，在上海组成了众多的读书会、报告会、时事座谈会和聚餐会。他们座谈、演讲，写文章，奔走呼号，壮怀激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上层知识界中崛起的“十人小组”（或名“十人聚餐会”），它以左派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为召集人，以怀带着中共《八一宣言》的地下党员胡愈之、周新民等人为推动者，成员有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等等。这个小组没有公开的旗号，没有庞大的阵容，但是它有强大的影响力

和渗透性,如星星之火,如原子裂变。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妇女、文化、教育、职业、工人各界,在群众运动和“十人小组”成员的推动下,先后成立了救国会,发展了数万会员。

江河汇海,众志成城,正是在这样的形势要求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这血与火的日子诞生。

在下午的成立大会上,推举德高望重的上海律师公会会长、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沈钧儒为主席,推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刘良模、沈体兰、沈兹九、顾执中、潘大逵、彭文应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市的抗日救国运动。

800多名会员代表热烈欢呼领导机构的诞生。但是他们还不满足,他们高涨的爱国热情要求迸发式的进一步行动,他们要求组织一次抗日示威大游行。

沈钧儒和执委们商议,决定顺应群众的要求,趁热打铁,把救国会的大旗打出去。他指定擅长做宣传组织工作的李公朴为游行总指挥。

1927年北伐时,李公朴便是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的宣传委员,练就了一副大喇叭似的好嗓子,会演说,会唱歌,可以鼓动三千子弟欢歌笑语去冲锋陷阵!可是,正当他整顿好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的“警犬”闻风而动,刹那间就派来一万多名武装警探把市商会团团围住。

原来市商会的大门开在北苏州河路,出门便是公共(英)租界。

自从1840年迄今100年来,大英帝国送给中国的是鸦片